

教育資料與研究雙月刊

第69期 2006年4月 1-14 頁

台灣五十年來主體性的教育建構

林玉体

摘要

台灣教育，在過去五十年以來，台灣所佔的比例太少，而教育又有偏向。批評者每指責數百年的「台灣教育」，既「反台灣」也「反教育」。「反台灣」就是把台灣看成沒什麼重要，甚至隻字不提，偶一提之，都是負面的。「反教育」則一來以學術迫害來阻礙學生智力的發展，服從心態掛帥，不只受教育者腦筋未見開發，反而有被窒息的可能；二來在品德教育上，公然把仇恨作為教學重點，與「愛」的教育背道而馳。就鄉土教育而論，台灣本土語言及教材未見整理、研究、及教學。幸而經過台灣主體性早些覺醒人士的奮鬥及抗爭，現在才見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中，開始有了名實相符的台灣主體意識的教學。主體意識中最為核心的莫過於國家認同，這在過去的政治教育中是霸權十足的一言堂。台灣是否可以成為獨立國家，至少應讓師生知悉過去有過這種史實，現在則在爭論中。主體性的教育，不該閃避，不可扭曲，更不可打壓。學術自由之有無，此一議題是最佳的考驗。

關鍵詞：台灣主體性、國家認同、歷史教育

林玉体，考試院考試委員、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電子郵件為：c167@exam.gov.tw

來稿日期：2006年2月20日；修訂日期：2006年3月1日；採用日期：2006年4月13日

Fifty-Years Taiwan Subjectivity i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alization

Yu Tee Lin

Abstract

Promoting the level of subjectivity 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Taiwan as a nation is a critical and very sensitive topic in the past for fifty years. Relatively, this topic would be eventually and virtually contexted with the educational policy, curriculum organization, and the mentality of teaches and students. Unfortunately, academic freedom in this Island has been suppressed over one century. In the area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writing, this topic has been ignored in the educational literature.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educational reform could not have any expected success.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consciousness of Taiwanese self recognition during the past 50 years in politics and educ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help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building.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would throw light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controversial debates between Taiwan independence and unification with China.

Keywords: Taiwan education , political subjectivity, self consciousness

壹、前言

中國歷史上第一種報紙《申報》（以後是商務印書館）於二十世紀之初，邀請名家學者撰文評「五十年」及「一百年」以來的世界及中國之政治、經濟、文化、哲學、教育等之演變；為「文教」領域保存了頗為珍貴的「資料」。國立教育資料館在慶祝五十週年館慶時，如能有系統的仿照當年《申報》措施，則也是台灣學術界的盛事。二十世紀已然結束，二十一世紀剛剛起步，半世紀或一世紀時光，在歷史洪流裡並不算太長，但客觀上時間的久暫，並非深思熟慮者的重點所在，關鍵在於變遷之大小或快慢。單以五十年來的台灣教育資料，就內容上予以解析，就可以了然於教育觀念之前後有別，可以在教育史上大書特書！

以五十年作一階段，尤其是二十世紀的下半，在台灣教育史上最具革命型的轉換意義。台灣人當家作主的訴求，過去是有殺頭之虞的，現在反而變成人人朗朗上口的口頭禪。但反應在文教措施的，並不如在政治上的迴響。原來教育尤其是學校教育，是保守份子的大本營，只能與政治進展亦步亦趨，這也不能單怪台灣，卻是全球皆然。

「教育資料」有時間性及空間性，具體的來說，時間性就是歷史（過去、當前、及未來），空間性乃指地理環境。就台灣而言，台灣的教育資料，當然以台灣為主，環繞在台灣週邊的為輔（空間）；且以台灣教育的演變為優先（時間）。這是兩大主軸，一經一緯，缺一不可。而教育資料包山包海，因為教育的性質本來就是如此。因此教育資料應是汗牛充棟，無法勝數。

有牽涉到教育內在本身的，也有纏連到教育外在因素者。就教育史的角度來看，世界上文明國家的教育興革，多半是由外往內的操控，而少發生由內往外的波浪。換句話說，教育改造，教育圈內的人，出力較少，有時不只出力不濟，且經常橫梗當中，「保守」是教育工作者的代名詞。而左右教育方向與政策的外力因素，無疑的，政治扮演一重大支配力。教育的疑難雜症非常之多，大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早就醒目的指出，教育是人間的兩大艱鉅工程之一（另一是政府組織），此言誠屬非虛。單就台灣而論，關心者不可不注意此一議題。

教育研究，可以「巨觀」（macro-vision），也可以「微觀」（micro-vision）。前者先取其大，即從高瞻遠矚的佈局著手，後者即小題大作，在方法或技術上下功夫；前者靠「智慧」（wisdom）或「通識」（general education），後者依「知識」（knowledge）或「專業」（professional education）。教育科學化的結果，「專業」成份日濃，但「敬業」及「樂業」相形遜色。教育圈內的人都知道一句名言：「教育無他，愛與榜樣而已」。套句台灣政治上的諷刺話，「選舉無師傅，用錢買就有！」我們可以用正面的語彙改為：「教育無師傅，用愛滋潤就有！」獎掖人才的教育措施，動機與意願最不可或缺，如果能讓師生自動自發的發揮奉獻、付出、犧牲的教育精神與情操，則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棘手的教育問題雖無法迎刃而解，但已不必太過操心，因為教育機器已然正常運作，不必庸人自擾了。最艱鉅的工程，基底已打造完成，且骨架也安裝妥適，「師父引進門，修行靠自己」；「有狀元學

生，無狀元先生」，這些話印證出一流的教育見解！

教育過程如同人生在世一般，都在作「追求」(searching)工作，蘇格拉底(Socrates, 470-399B.C.)的「知你自己」(know thyself)名言，是曠世哲學家的座右銘。「自己」就是「主體性」(subjectivity)，任何人類思考或活動，包括教育，無不環繞在此一議題上打轉。「主體性」的教育建構，殆為台灣當前最迫切的課題。放眼環球的教育發展性質，更能突顯出台灣教育研究者，不能忽視此一現象，否則就是嚴重失職，也無法為歷史交代，為下一代子孫交出一漂亮的教育資料成績單！

貳、台灣教育主體性的政治發展面

居住於台灣這個地理區域的人民，對於「自我」的體認，大概與全球其他地區的住民沒什麼兩樣，尤其與中國人民更無重大差別。台灣的原住民由於黑水溝的隔絕，過去航海技術之拙劣，以及中國人安土重遷之觀念，台灣海峽「兩岸」住民在「自我」層次的認識上，頂多達到族姓的地步而已，未有極其明顯的「國家」觀念。十五或十六世紀葡萄牙人憑其較為精湛的海上遠洋船隻建造及冒險精神，在通過台灣的天險時，遠眺寶島而驚呼Formosa之時，外人即以Formosa來稱呼台灣，其後歷經荷蘭、西班牙、明鄭、大清、日本、及中國國民黨的統治，這些政治階層的轉換，加上世界文明之光的漸漸投射於這個海隅島嶼，台灣住民對「國家」觀念之消長，著實是獻給政治學者一種最佳的研究題材。

簡言之，「自我」意識蘊含的意義與範疇，是學術界嚴肅探討的議題，就其意義而言，「自我」包括著自立、自強、自尊、及獨立等語彙，此種意識高漲時，在政治上當然要求自我了斷，當家作主，不依附他人，這就涉及了權力的掌控，連帶的也滋生出「自我」的範疇問題。「自我」的範疇，就其最狹小的地盤，當然是「我」自身。但文明的演進，個人是無法離群索居的，「己」與「人」之社會臍帶，必然存在；家庭、社區、氏族、種姓等意識也就自然萌生。就現代的政治組織結構而言，這就是村、里、鄉鎮、縣市、省、國，甚至擴大到洲際及寰宇的層次。如果把時光限定在五十年來論，台灣的文教活動上，自我意識由「我」擴充到「國」，實在是一種極具意義及興趣的觀察！

「台灣」之作為地理名詞，現在已無可爭議，但作為政治名詞，則必然吵聲震天。明鄭時之「東寧王國」，時祚雖不長(1662-1684，計22年)，不超過「一代」(30年)，但卻以「國」自稱；這比荷西時代之成為殖民地，在政治上的自我意識上，高漲了不少。其後大清時封台灣為「化外之地」，「自古不屬我版圖」，台灣人對「國」之觀念也極其模糊。但1895年在聽聞要割讓給日本之時，頓然組成「台灣民主國」，這是台灣士紳非常令人震驚之舉，學者黃昭堂教授有《台灣民主國研究》一書，揭露了台灣住民曇花一現的獨立國美夢。在政治時潮中，以「台灣」為國名，性質又是「民主」，標榜台灣不是受他國管轄的郡府，或省而已，卻是一個「國」，有國旗（黃虎旗），國印（黃虎印），國號（永清），國幣，郵票，又有「總統」頭銜，在亞洲歷史上成為「民主國」

的陣容裡，搶了頭香，比台灣學生耳熟能詳的「中華民國」誕生還早十七年。雖然台灣民主國之出現於地球上不過數日光景，但「船過水一定有痕！」作為台灣的師生或住民，難道對此一可歌可泣的歷史事件，不該列為歷史教科書中最應受到垂愛的教材嗎？

台灣人民揭竿而起，以武裝抗日作為自我意識在政治上的主體性醒覺，「阮是開拓者，不是憨奴才」，「寧可戰死而割台，決不拱手而讓台」，這種宣言與主張，是驚天地而泣鬼神的。不過，日本當時軍威在亞洲居冠，不只於1895年一戰而擊敗東亞病夫，隔十年的1905年又再戰而戰勝了北極熊；此種顯赫的海陸軍，已把全球地理面積最為遼闊的大國打得落花流水了，又哪會把「竹篙導菜刀」（台語）的台灣義勇看在眼內。台民既以鮮血衛「國」，日軍也以鐵蹄肆虐，「台灣民主國」瞬間即逝。其後統治台灣的日本及中國國民黨，由於極度恐懼台灣住民重燃建國念頭，一來無情鎮壓台灣「國」觀念者，二來在文教活動上，絕口不提台灣民主國的興亡史，絕大多數的台灣住民，幾乎無知於此段史實。有關這方面的文教「資料」，差不多蕩然無存！湮滅歷史證據，莫此為甚！欲滅其國者，先滅其史；史家連橫早已言之。

半世紀之前，由中國大陸撤退來台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對於殲滅台灣人民自我主體性之上漲到「國」觀念者，絕不手軟於日本。透過教育之內及教育之外的任何手段，處心積慮且變本加厲的扭曲台灣本土意識。「台灣」之一切，如能消除淨空，那是上上之策，等而下之者，則限定了自我主體性的範疇，絕口不提台灣是個

「國」，具體措施，是昭昭在目。首先，台灣是個「省」，是「中華民國」的一行政區，隸屬於「中華民國」之下；又將台北市及高雄市升格為院轄市，與台灣省平行，上層還有個中央政府，在許多國家大政上，尤其是軍事及外交上，不能獨享全權，而文化、教育、及科技上，也得聽令於中央的「中華民國」之總統府，台灣在台灣人的眼裡，地位大幅旁落在「台灣民主國」之下。其次，「台灣」最好以他名代之，用「閩南人」來代替「台灣人」，說的話是「閩南語」而非「台語」。無台灣歷史、地理、文學、音樂、美術、體育、技藝等教學，完全由中國文化包辦一切。第三、即令不得已而出現台灣時，以不屑、謾罵、抹黑，或扭曲對待之。師生以說台語為恥，慣說台語者是下賤，穿拖鞋，嚼檳榔，出口三字經，地痞，流氓之輩，台灣歌仔戲不入流，而滿嘴字正腔圓還凡化韻，捲舌音國語腔調者，不是博士，就是教授、律師、醫生，是屬上層階級身分者。「刻板印象」(stereotype)的濡化現象，尤其在學校教育內效率最為卓著！台灣師生經過這番長期的黨化教育之薰陶，台灣主體性頓然冷卻，自信心悠然而逝，且自賤自殘，不甘願作為台灣人者有之，而以中國人自居，自詡吸取博大精深又悠久燦爛的「五千」年文化，台灣文化那能相提並併論！中國國民黨的文教政策，是以中國文化來麻醉台灣的下一代，而台灣師生又因政治之失去主體掌控權，因此無知於台灣文化在歷史上珍貴的一面，台灣成為「國」之意識，長期以來，無法浮上檯面，文教活動上更銷聲匿跡。「作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是各校校園內最常見的標語，「新中國的小主人」，更是從小就

對稚齡幼童的期望！

台灣人主體性意識高漲到以「台灣」為「國」名，一百多年前之「台灣民主國」，猶如在漫漫長夜中劃出一道光芒的彗星，看在日本人眼中，必欲去之而後快；這種事件如發生在1945年以後由中華民國統治台灣期間，也是不可思議的，嚴厲及殘酷的取締，必定難免。台灣文化史上的悲劇，過去一再上演，台灣師生對此竟然懵然無知，這是一種難以洗刷的罪過。學術界及文教界也不應諉過塞責。

自我主體性層次之提升到政治境界，即獨立建國意識之存在與落實，這是會隨時間之流逝及條件之變遷而有更易的，世界上許多地區之稱為「國」者，過去都僅是只有地理上的意義而已。如新加坡、加拿大、紐西蘭等，這些名稱，目前都是「國」家之名。衡諸當前的處境，台灣之成為「國」，不只在過去有過歷史先例，現在雖然大敵當前，但主權在民的民主教育理念如能早日落實，正是台灣人命運的重大轉機。

參、具體的教育措施

教育離不開政治，政治不是只有污濁面而已，也有清澈面。大白天之下光明磊落的討論政治議題，理性、冷靜、客觀的評價教育政策、宗旨、及方向，這正是教育政治化的一種重要面向。當然，此種措施，應該配合學童身心發展的認知階段，這才符合教育原理，教育成果也得賴此方能見出績效。

近年來，教育學術界普遍接受皮亞傑（Jean Piaget, 1896-1980）的學說。其實就學齡發展現象，人性之欲、情、理三性之依

序作比重之消長，這是古今台外的教育普世經驗，也是無可爭議的教育事實。因此，國民教育階段（即中學以前）的教育主軸，應以感性教材為主要選擇。俗話說，人不親，土親。其實，不只土親，人也得親。在課程及教材編製上，以大家有共識的理念，來培育下一代的「團契感」（sense of community），這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教育哲學大師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在《民主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的基本架構。

一、勿將有爭議的政治議題，置於國中及國小甚至幼兒教育的教學活動中。諸如「我國地圖」、「我國唐代」、「三民主義的教育宗旨」、「國歌」、「國號」、「國父」、「民族救星」、「一代偉人」、「新中國的小主人」、「三民主義的少年兵」、「台灣光復」等，皆不宜作為國民教育的教材。欺騙是一種最重要的品德污點，教育尤其不應因兒童之無知，而強迫灌輸未經理性分析或批判的辭句或觀念！一來引發日後見解較成熟且思慮較開放時的極力反彈，二來也容易造成家長之極力杯葛與抗議。

「由近及遠」的唯實（realism）教育學說，教育哲學大師赫爾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 1776-1841）之「統覺論」（Theory of Apperception），都是教育原理中的天經地義，「新知識建立在舊經驗上」，此種說法，又有誰反對？這種精神，具體化於國中以下教材編整上，教育的正常化才可步上正軌；且依據人之常理，學童對鄉土之具體感及親切感，熟悉度及親密度，必然是與生以俱來，若能透過教育途徑，作學理上的介紹與說明，就地理、人文、歷史等方面的剖析，則學生在知識

的廣度及深度上必獲益匪淺。因此烏來地方的中小學生，以「我們都是烏來人」來取代「我們都是中國人」，「作一個新烏來的小主人」來更換「作一個新中國的小主人」，將「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改為「堂堂正正的烏來人」，即令最近才由外地轉入烏來的居民，難道不能以作為「烏來」地區的住民為榮？在烏來任教的老師，如果不是土生土長的烏來人，也應以有幸來烏來服務，為一生難得的機會。這種鄉土的認同感，可以贏取當地住民的感動。先在心理建設上鞏固此一地盤，然後進一步來探索該地鄉土的語言、習俗、信仰、歷史、地理、山川、氣象、動植物、農作物、歌謠舞蹈等，這些都是俯拾即是最佳研究材料。此外，時時進修，佐以國際級的為學方法及知識水平，不孤芳自賞，不敝帚自珍，但從中挑選具有教育意義性的部分，作為中小學教學活動的主幹。至少讓烏來的中小學生知悉「烏來」一語的原住民語義（溫泉），烏來的發展簡史，烏來的鄰近鄉鎮等。台灣的教育，當然以台灣為主軸。愛，如果算是人生活動的引擎，則愛台灣之先，不如先愛烏來。烏來不愛而說愛台灣，這是欺人之語；不愛烏來卻奢言愛台灣，猶如不愛台灣而空談愛中國，那是捨本逐末，棄近望遠。

萬丈高樓平地起，地基打好，才能廣廈高聳入雲。中國傳統文教的好空言、喜虛幻，是亟應興革的盲點。連國小校門口的醒目牆壁上，還以昂貴大理石刻上「為萬世開太平，為往聖繼絕學」的「名言佳句」，看在小朋友心中，是無動於衷的。道德說教以及政治八股性的口號與標語，到處張貼於教室，此種教育結果，必定大打折扣，民主式教育之功敗垂成，這是一大

主因。

以烏來地區為例所編製的中小學教材，如同上述，則台北縣地區或台灣各地區的中小學教材，就能顯示出多元性、歧異性、分殊性的功能。百花齊放，必能增加教育資料的豐富性。學童、教師、家長、及其他社會人士可以在「自尊」領域上，要求本地區之教學活動所依的鄉土教材，在自我意識的覺醒上不落人後。除了比較他地區教材之優劣外，更警覺到本地區文教亟待興革及改進之處。地區文教之特色都能獲得重視，且也他山之石以攻錯的向上提高，這是文教升級的不二法門；此外，因鄉土之親切性所散發出來的溫暖感，必能激化學童及成人的性靈。在自卑與自傲中取得平衡點，這不是最為健康的人格教育旨趣嗎？

傳統的保存與傳遞，有待教育，但這只是教育的靜態工作而已。嚴肅的說，傳統必賴文教的洗禮。此處傳統與他處傳統之衝擊，取批判角度視之，或許可以激蕩出「創新」文教的可能性，這才是進步教育所呈現的另一面貌。「主體性」是不可有排他性的，「容忍」本是現代社會的一大美德，那是化解因歧異而生敵對心態的最佳解毒劑。其實，容忍只不過是初步，當然，這一步也是步履維艱；容忍之後應是了解而非誤會，了解之後截長補短，見賢思齊，補偏救弊，進而提升為接納、欣賞並參與，則「一體感」（sense of identity）就油然而生，散沙之污點也成為歷史名詞，心甘情願的團結，最是彰顯國力的最佳保障。

由於台灣主體意識的漸漲，本土傳統的民俗技藝及信仰儀式，近年以來有走入魔傾向，費巨資興建王船然後燒毀，烽

炮之年年盛大舉辦，廟宇雖屬違章但也大興土木，這都有必要以知識的視野及寰宇的眼界來予以檢驗。「凡存在必有價值」(whatever is, is right; to be is to be right)，這是最不動用腦筋的靜態教育哲學觀，也是最不足取的教學活動樣版。不幸，當前台灣各地中小學教學之仿此者頗多。不求超越與創新，則仿古如長夜，文教活動如死海；就常識而論，除了外力強迫壓制之外，「維持現狀」絕不可能是事實。台灣中小學教育之本土化如停滯在此一層次，是對文教活動的扭曲見解所致，也是惰性使然，不足為訓。

二、文教活動之活潑性、動態化，且激奮性，大可以把高中以上的校園當最佳舞台，在高中以上的年齡階段裡，恰好是神秘潛力及英才展現的最好時辰。而理性之運作，也隆隆作響，政治理念，政黨選擇，主義優劣，國家認同，都可以在這個時段之際及其後，大大方方的作為辯論的題材，不必忌諱，更不能壓制。主體性意識一臻公民年齡層，不過問政治，那是失責也失權的自我作賤作風，如屈服於權威當道之下，而對此噤若寒蟬，那是欠缺勇氣的最直接證據！

首先，台灣是現存世界上「國家認同」最有危機也最為不穩定之處，此事不妥善獲得解決，一切政治重大問題就賡續存在，更不用說也連帶的滋生出必須解決的教育問題了。國中國小一定得把「我們都是烏來人」放在烏來地區的學校教科書內；學生上了高中及大學，自我意識，已從鄉村、縣市而擴展到「國」了，台灣是一個「國」嗎？還是只是一個「省」，附屬於另一個「國」之下，高中生以上自然的會提出此一問題，可以以「一言堂」方式

予以「解惑」嗎？這是痴人說夢。橫在台灣住民包括高中以上學生在面臨「台灣人」是否等於「台灣國的人」時，必須想辦法釐清。當年連雅堂大膽的向清國巡撫及日本總督說：「余，台灣人也！」他的「台灣人」是否雷同於「台灣國的人」，是有疑問的；不幸吾人無法牽亡魂似的把連橫從陰間引到人世來說明清楚，但他其後改口說：「余，中國人也！」卻在政治意識上一清二楚的。「台灣人」在等同於「台灣國的人」時，「台灣人」才與「中國人」同一位階！

再者，觀念的釐清，有必要經過民主的程序。當然，要有圓滿的結果，所需的條件頗多，且也非易事。但台灣的民主教育，如拖延或迴避此一議題，都非負責任的表現。中國往昔學者戴東原曾經建議，學校是議論朝政的所在。雖然學校不必一定如同立法院或國會，但准許甚至鼓勵高中以上學生積極的討論台灣是否為一個「國」，又有何不可。反對的人難道希望師生在背地裡高談闊論，而擔心自己的立場禁不起理性的檢驗！國家認同問題牽涉到忠誠問題，也與公民教育息息相關。遵循開放式的民主討論，讓正反雙方都能充分的陳述已見，批判對方，從中培育良好的民主風範，接納別人較高層次的異見，或為己說提出高格調的辯解，則本來或許是正確之見，可以漸漸的變成多數人之見，共識也因之形成。固執己見者就漸漸成為少數，無事實證據及邏輯推理者，自當銷聲匿跡。「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台灣的學生如能養成說理習慣，則對文化品質的提升，幫助必出奇的大。

三、本土性的教材，經過一番汰選，也可上臻國際觀層次者，則可以與他國之

本土教材並列於教科書中。「由近及遠」是以「近」為「起始」或「出發」點，但並不停止在「近」上，卻應有遠眺及前瞻，並且應向上升級。擴展宏觀的視野，加深知識的程度，是學校層級之有高下區分的用意所在。台灣本土資產經過學理上的加工，可以更為精緻化。高中以上的師生，應汲取歷史上及先進國家的經驗，研究一流理論，來探索台灣所特有的自然景觀、社會科學及人文科學。舉例來說，歐洲的學術界把歷史上希臘羅馬時代的戰爭、運動競技、哲學、小說、科學、醫學、天文等，整理出一套系統的學術資產。台灣信史雖只四百多年，但歷經西洋及東洋文化的衝撞，其中必然有哀怨動人且情節曲折的小說。遺憾的是，台灣先民歷經數百年來的政治束縛，文教又不注重，世界級的菁英埋沒在寶島裡，過去的教材，不是歌頌歐美的洋人，就是抬高中國的儒家。認真挖掘，台灣土生土長的畫家、音樂作曲家、詩人、或小說家等，造詣或許不遜於歐美之下，這方面，台灣人當然不應該自我吹噓，自我膨脹，卻可以拿國際標準予以衡量。高中以上的學生，應有出國深造的打算，才不致有井底蛙之見，以管窺天，或以蠡測海。台灣學生的學業成就，在日本治台期間，於「日台共學」的學科表現，絕不落日生之後；而自1945年以來，中國大陸人士轉來台灣就學者，台灣及中國籍學生之成績，最少是不相上下；至於留學國外者，紛紛在世界一流的大學取得最高學位，擔任大學或研究機構之教授者，指不勝屈，且有獲取諾貝爾獎者。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第一位女醫生邱雅信，第一位文學博士林茂生，這些事例無不令先進國家的學者刮目

相看。他們學有所長，佐以國際級的學術觀來系統的研究台灣本土資產的一切，則寰宇觀（globalization）就指日可待了！

肆、專業、敬業與樂業

當前的台灣教育之普及及高等學府之普遍林立，已是全球一大奇觀，這種量的快速擴充，如能輔以質的提升，必然可以為台灣文教揚眉吐氣，但主軸當然以台灣主體性為核心，且台灣國家認同也是當中最不可或缺者！

隨著知識經濟之蓬勃發展，科技人才輩出，「專業」菁英似乎並不匱乏，但如無法在敬業及樂業上加一把勁，則台灣住民之迷惘、憂鬱、苦惱，當有增無減，自殺率必然直線上升，轉業百分比也奇高。這是因為「不知為何而活」所造成。健全的人生觀並不著重時，台灣主體性的定力，將是疏解此一棘手問題的良策！

現在的台灣，大敵虎視眈眈，將近千顆的飛彈放在中國，對準台灣而設。由於歷史、種族、及地域的複雜因素，導致台灣教育，在國家認同上產生極為紛歧且又長久爭論不休的話題。其實此一議題，如能訴諸公開討論，則共識之達成，將可預期。這幾年來的各種民意調查，台灣主體意識之明顯漲高，大部分是靠政治力的選舉言論所造成，學校教育界反而對此話題，裹足不前，甚至公然唱反調。師生如心中有主，不生迷惘，則敬業與樂業活力將滾滾而至，奉獻、犧牲、付出等高層次的服務情懷，也就沛然充斥於校園及社會中，這是文教高水準的表現。相反的，由於一些人對台灣沒信心，還唱衰自己，等而下之，更在內心裡作出為敵國裡應外合

的準備：除了心態不正之外，私德與公德皆有嚴重的瑕疵。坦率言之，認同台灣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此種意識上的覺醒，相信會從過去的少數，快速的成為多數，且成為壓倒性的多數；政治力之外，如佐以教育力，此種傾向，吾人有把握是正確無比的。

教學生涯既有意義，也獲有尊嚴，人生方向已定，則除了敬業與樂業之外，也無形中增強了專業的進修。為自己與學生解惑，趕上時代，專業上的終生學習，敬業與樂業的持之以恆，則台灣文教必能在歷史上盛開花朵。

一、重新尋找台灣主體性的定位，不必仰他人鼻息，尤其是熱臉貼上中國的冷屁股。由於文教內容的偏差，不少台灣師生神化及美化了中國的文教史，蔑視台灣先人的披荊斬棘，自卑感怎能有敬業及樂業的心境，更不用說是專業了！台灣的校名不應拾本國而就他國，以陽明大學為例，這所標榜醫科為重點的優秀大學，為何不改名為「渭水大學」？王陽明何德何能，他又未曾來過台灣，本身又與醫學研究毫不相干，且格物致知上以「心學」為主，大大的違反了科學研究的基本旨趣，如加上他曾領大軍屠殺貴州苗人四萬，且斷定原住民是禽獸，「殺之無妨」，則台灣的高等學府，為何連這種最起碼的反省醒覺工作皆無！台灣人尊敬學醫的孫中山，以中山為名的學府機構多得無法勝數，為何比喻為「台灣孫中山」的宜蘭蔣渭水，卻是絕大多數的台灣師生對之異常不熟悉！北部最漂亮的山，原有的「草山」是名實相符的，為何改名為「陽明山」，至於國際級旅遊觀光的東部橫貫公路「天祥」景點，也本有原住名稱呼，文天祥曾腳踏

過台灣嗎？諸如此類的例子，不知凡幾。台灣本土化，正名及改名，都是當務之急！為他國造就人才嗎？尤其這個他國，對台灣極為不友善，是台灣身處國際社會裡，處處以惡毒的手段又經常出言不脛來對付台灣的國度。文教界竟然在台灣主體性的意識覺醒上，對此不聞不問，怎能孕育師生之專業、敬業、及樂業呢？相反的，怠工及不合作，必成為校風。

教育活動中，與政治較無涉的部分，就是「專業」的領域。但人文歷史的主體性覺醒，卻也賴專業上的鑽研。如上例，如不加強台灣歷史人物的了解（這是專業的部分），則如何能知悉諸如蔣渭水在歷史上的定位？他在醫學上的造詣，最少不輸給孫中山，在文化上的建樹，也不亞於王陽明，而對人道的關懷，如與中國的聖賢相比，絕不遜色；他的專業、敬業、樂業，更應為後人所效法。蔣渭水是台灣主體性意識的運動中，可以作為校名或教材中之九牛一毛而已！

主體性意識之覺醒，時間有遲速之別，人數有多寡之分。但台灣教育活動中，如注重此種面向，則成效必然卓著。1895年，「台灣民主國」胎死腹中，現時有人唱言「台灣共和國」，如能在文教界中加把勁，則必在歷史上大放異彩。在教改聲浪中，不少人迴避此種政治議題，這是懦弱膽小的明證，也是智慧不足的表徵。

二、在教育哲學的地盤上，傳統中國或歐美古典學派，大談「終極」目標，「止於至善」、「大同世界」、「真善美」、「永恆」、「絕學」、「至道」等名堂，皆異名而同實。此種極為遙遠的烏托邦境界，為文教界所歌頌，用現在的字眼來說，美其名為寰宇觀或普世價值，不是地域主義

或鎖國作風。學童從稚齡開始，即熟背聖賢書，一生皆期於能「俟諸處世不惑，放諸四海皆準」，這是中國人的最愛，以為目標崇高，眼界超越，無時空性。這種哲學觀及哲學教育理念，在歐美中古世紀裡，仍然是一門顯學。不只形上學當道，宗教色彩濃厚的「教父哲學」(scholasticism)也是主流。此種理念運用於教育實際措施時，鄉土教學即被忽略，局部性及地域性的特色也遭消除。不過此種哲學思考，卻是靜態十足的停滯不前，因為「典型在往昔」，「今不如古」，「一代不如一代」，「返顧」，一方面是自信心蕩然無存，又何必「專業」？另一方面則頗難樂在其中，因為成就感不存，再怎麼努力，也有「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之嘆！進步式的教育觀及人生觀則與此大異其趣：兒童至上，前瞻，把握當前，「end in view」，注重當下，目標也是在「可預見」的範圍才具意義與功能。這兩大派也就分屬「寰宇觀」(globalization)及「本土觀」(localization)。好高騖遠是前者的特色，但那是一種虛幻或是一種夢想，缺乏實際行動的意願，因為懸的太高，動輒得咎，完成之日遙遙無期，這些缺點，名教育哲學家杜威早已為文有所指摘。後者比較有落實感，一步一腳印，更不必不自量力，未走先飛，打好基礎，站穩腳步，然後再思量下一步。如果終站(end)是「在眼前的」(in view)，就有策動力，欲罷不能，喜愛之，鼓舞之，欣賞之，評鑑之，更能從中挖取無窮或超出預期的奇珍異寶，讓世人喜出望外，如此更能豐富文化的內容。這都有賴於專業、敬業、與樂業！活潑、生機力旺盛，動感十足，師生樂融融，此種教育景觀，難道不是十分可貴嗎？

End in view並非停止在局部或鄉土上，就如同前述，此種教育哲學觀，適用全部的師生。「天生我才必有用」，台語言「歹馬也有一步踢」，對資質較差的多數人而言，量力而為；在以具體的，經驗界圈內的、五官可及的教材為學習對象時，印象必然較為深刻，不必如同古聖先賢之強調記憶及背誦，那是苦不堪言的，學習怎都在折磨中度日呢？其次，潛力的發揮如同一種謎樣的棋局，什麼時候解竅，無人可以預料；但天份資質之能否大展其才，動機力是最重要的關鍵。不必擔心輸在起跑點上，「大雞慢啼」，或許受到鄉土親情之召喚，靈感頓時萌出，與其模糊的嚮往王陽明或文天祥，不如親訪蔣渭水或林獻堂住家，一遠在天邊，一近在眼前；有機會搭機前赴中國造訪的人數，絕不會多於開車或步行即可到達的宜蘭或台中。並且就文教貢獻上，台灣的先賢絕不亞於中國的儒生，拋棄「貴中賤台」的心理作祟，又那能「長敵人志氣，滅親人威風」呢？注意，現在的中國與台灣的关系，台灣師生可以認賊作父嗎？取文教作為達成政治統一的工具，是會有強烈侵略性的，這已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行，而唱本土意識及獨立建國者之重視台灣，只不過是一種自衛而已，師生既有歷史使命感，則「目的」(end)可以往前推進，向外擴張，這是無邊無際的，突創性及原見性(originality)必然十分驚人，或許如同古代雅典的文教盛況，會出現在寶島！台灣文教人士如能開創此一環境，掌握此種契機，則專業、敬業、與樂業就三者合一，攜手完成台灣文教史在全球文教史上的盛事，不是有無比的榮耀嗎？

伍、檢討與展望

台灣的教育，在過去有許多敏感又禁忌的議題，其中與本文有關者例舉如下：

一、師生只可說自己是「中國人」，不可說是「台灣人」：奇怪的是，從中國來台的師生則可說來自「江蘇」或「四川」，但台灣籍的師生卻不准只說「台灣」，卻得在「台灣」之前，加上「中國」。所有的師生填寫資料，一定得追溯祖籍到中國時才止。師生說「台語」或台灣的語言，一律在禁止之列，違者遭記過、罰錢等處分；中國來台的師生則可說家鄉語，「省籍歧視」極為明顯。教材選擇是不提台灣，或少提台灣（所佔百分比，與中國相差有如天壤），偶一提之，負面多，正面少，不利於台灣的主體意識因之形成，對台灣主體意識是一種嚴重的傷害。尤有甚者，更出現不少「反台灣」的教育措施，認定台灣無文化、無文學、詩詞、台語老歌沒水準，戲劇是下流社會人的嗜好，「台灣」何辜？究其原因，乃是中國國民黨執政時，特別對台灣人的台灣主體意識，視之如同洪水猛獸，又警覺到1895年曾經有過「台灣民主國」的歷史事實，更憂心於海外台灣人獨立建國運動，因之利用教育文化的普及，強迫這一代及下一代的台灣住民，對台灣歷史的失憶，又透過全方面的宣傳，增強中國印象的美好一切，「博大精深」、「歷史悠久」、「二十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這正是台灣半世紀以來的教育及文化寫照。教育極不具中立的此種現象，可以說是台灣教育最為悲哀的一面，執政當局最應為此負起教育史責任。不少政論家讚美五十年來的台灣教育，在量的進步上有目共睹。不過衡諸於全球教育的

普及化，極權國家的業績最為卓著，原因無他，教育完全變成工具，是達成政黨政治目的的手段。雖然政黨目的也有足可歌頌的一面，但凡是極權專制國家，則其政黨目的，幾乎毫無例外的是見不得人的！如果全民教育且又把國民教育年齡往上提升，則所有國民皆無所逃的接受政治教育的荼毒，則此種教育不存在也罷，不只無功，還應記大過！

二、1945年日本政治勢力退出台灣，台灣的命運卻無法自決，又落入中國國民黨手中，1947年發生全台歷史上最為慘重的二二八事變，隨即實施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是世界史上最長久的封鎖，1949年又在當時全台的最高學府台灣大學及師範學院（現在的台灣師範大學）出現了四六事件，台灣的學術教育活動就無法正常化了。幸而隨著台灣意識之萌生，又因台灣在行政權力上早不歸屬中國，致使「一中一台」的呼聲浮上台面，加上1980晚年戒嚴令的解除，教育所受的政治壓制也從此鬆了一口氣。從歷史視野觀之，台灣意識的消長進而台灣政治主體性的公然呼籲，且在法律上又能獲得安全保障，這是台灣文教史及政治史上最為傲人的表現，在亞洲，此種奇蹟，僅次於日本，中國最是落在台灣之後。早在一百多年前，台灣的祖先就在1895年成立「台灣共和國」，但不旋踵即被殲滅，統治者日本總督府無情的武力鎮壓，台灣住民慘死在鐵蹄之下，到了1915年礁吧年事件後，台灣的「亂」事底定，從此台灣士紳不敢唱言台灣獨立，此種意識潛存於心中，頂多是哀求統治者給予自治，在文化、教育、衛生、醫療等層面稍作改善，或是進行議會請願而已。1945年台灣統治者丕變，由日轉中，當時

台灣師生的立即反應，是以迎接王師心態來對待執政當局的，絲毫無政治獨立的企圖。不意心靈及肉體上所受到的煎熬，更是變本加厲，哀鴻遍野，台灣意識者頓然醒覺，原來數百年統治台灣的執政者，理念及身份都是外來的，且皆心不在台灣。台灣住民有史以來都由他人作主，荷蘭、西班牙、鄭成功、大清、日本、及中國國民黨，在這方面，都同屬一丘之貉。部分台灣人最近才猛然頓悟，原來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此種發現，正是台灣最近十年來最不可抹煞的成就。當然，台灣的未來，萬世之後會如何，end in view的人生觀不必為此操心，倒是好好運用可資利用的條件，開拓一個滿足的生活環境，寧可為眼前著想，何苦為終極煩惱。尤其是國家的認同，隨時都會發生變化，就吾人所知的現況而言，台灣主體性的意識覺醒，尤其在政治層面上，最迎合後現代思想的潮流！

三、單以台灣作為文教主軸而論，就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素材。多元性是台灣文化的特色，具體而言：

（一）函宗教信仰：台灣有原住民的拜神模式，西方基督教勢力隨歐美強國抵台，荷蘭的新教（Protestants），西班牙的舊教（Catholics），蘇格蘭及加拿大的長老教會（Presbyterians），中國傳統的道教，輾轉傳播而至的回教及佛教等世界上最重要的教派，都在台灣佈道。

（二）刻語文：台灣早期的新港語、平埔族語、原住民語、漢文、日文、荷文、西班牙文，都構成台灣語文的一要素，近五十年來由於「國語運動」的雷厲風行，英文強勢語文的學習，又加上中國各省方言的零星發聲，台灣的語文已變成極

具獨特性而有待語文學者列為專精研究的對象了！

（三）券種族：台灣原住民不下十種，客家、漢人、日人及歐洲白種人皆在台灣生存繁殖、最近又有外籍新娘及外籍新郎的現象，中國各民族也群聚來此，混血兒已越來越多，台灣男人遠洋捕魚而與巴西女人因婚而生的林益樺小朋友，數年前變成法令訴訟（領養糾紛）及教育問題，是其中最轟動的教育新聞。

其他如建築、飲食、生活習慣、衣飾等，多元性十足的顯著，台灣是個異質性（heterogeneity）的文教區。過去台灣文教及政治界強力要求同質性（homogeneity），那是中國文教史上著重「一言堂」的落伍作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結果多采多姿的彩色文教畫面，變成死氣沈沈的單調景觀。多元性的文教，自然有其棘手的問題，但卻最能發展出最具創意的民主成果。文教活動中一方面特別著重包容性、接納性、欣賞性、參與性，一方面也不要忘了比較性與批判性，如此就比較能滋生出心甘情願的取長補短之修正與提升。台灣此種文教的分歧性，猶如一個小美國。史家每稱美國是種族的大熔爐（melting pot），此種比喻，是既不妥也不符史實。「大熔爐」即是把許多不同的元素（elements），以超強烈火予以熔化掉，剩下的就是單一的製品，單一製品中看不出原有元素的特色。若說多元性好比萬花筒、大雜燴、雜菜麵，這也是不倫不類的。比較理想且高品質的類比，是交響樂（orchestra, symphony），演奏的樂器很多，各自展現最優美的樂器音色與功能，但卻在樂團演奏中，有個指揮（conductor），所有團員都得配合他的動作。曲調的

高低、快慢等，極具協和和有秩，悅耳動聽，總不可我行我素，一意孤行。這個「異中有同」的「同」，就是國家認同，這當中，「異」（分殊及多元性）在評比之下，是會出現主流與支流的，如同民主社會的多數與少數。「台灣交響曲」的「主題曲」，當然是「台灣」；如無此種認知，就不配作為這個交響樂團的成員。如果「只要我喜歡，又有什麼不可以」，則這種成員，就是破壞份子，隨性亂奏，趁機搗蛋。當然，真正實施民主式文教的社會，因為既早已尊重異己，且欣賞其獨特性了，則不應會有此種敗類的！

台灣人命運何其坎坷，日本人治台時，大罵台灣學生是「清國奴」；俟中國國民黨來台時，又羞辱台灣師生是「亡國奴」。台灣人數百年來都是「奴」的身份嗎？擬當家作主時，都有個強敵環伺。還好，當前的國際局勢，雖然台灣政治主體意識的強化，仍然危機重重，但台灣國家觀念的塑造，在政治圈的努力之外，如能佐以教育的行動力，則必大有可為。法國作家兼旅行者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曾造訪美國多次，1776年之前，地球上並未有「美利堅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猶如迄今世界上還沒有「台灣國」一般，但這位頗具洞察力的小說家早就對北美洲大陸有個深刻的印象，他發現住在那個新樂園的居民，雖然種族、語言、宗教信仰、及心態上極具多元，但都認同「美利堅人」（Americans），不管祖籍來自荷蘭、德國、日本、中國、英國、法國、瑞士，不勝枚舉；婚姻國籍更顯複雜，但「美利堅人」都是異口同聲，這就形同交響樂團裡的成員，只有一位指揮一般。此種生命共同體

的意識，才是其後建國且國力超強的保證。目前的台灣人，祖父可能是「荷蘭的船醫」（安平追想曲的歌詞），中國的四川，加拿大的牛津郡，英國的蘇格蘭，曾祖母大概都是平埔族，孫女可能嫁給日本人，姪兒媳婦來自越南，媽媽是巴西籍，姑姑來自多明尼加，舅舅娶菲律賓女郎。這些都無關緊要，最攸關台灣人前途的是，如果居民都學學馬偕牧師，皆肯定自己是「台灣人」，樂意又甘願在這塊土地上享受現有果實，則依此而建立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那是最有保障的方式。不正常的國家，才会有不正常的教育。「台灣」之成為「台灣國」；也等同於「美利堅」之搖身一變而為「美利堅合眾國」，這是事在人為，而人為當中，教育力最為紮實，也最為牢固。最為不解且痛心的是執政的教育當局及負責教育改革的成員，對此議題畏縮不前。事實上近幾年來由行政院所組成的教育改革委員會的組成份子，絕大多數是抵制台灣主體意識者；奢言推動母語教學或鄉土教育，是頗見猶豫且想盡辦法予以拖延的。即令公元兩千年大中國意識的「中國國民黨」下台，由號稱具有台灣本土意識且在黨綱中明訂台灣主權獨立的民主進步黨執政，但在這方面的成績，仍令人大失所望，歷任教育部長，也只有現任的杜正勝才算是正港的「台灣」政府的教育部長，其他都是為台灣長久以來的敵國（中國）培育子弟兵。台灣政治主體意識的加強，教育部門最應加油！掛名「中國」的政黨仍在選舉中得勝，這是「台灣」選民的失責與認知的錯亂。而沒有好好的教育選民，教育行政單位就無法推卸重擔了！